



大国战略丛书·门洪华 主编

跨国公司 与美国霸权

[美] 罗伯特·吉尔平 著

钟飞腾 译

東方出版社

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

[美] 罗伯特·吉尔平 著

钟飞腾 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版式设计:陈 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门洪华 主编

钟飞腾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9

(大国战略丛书)

ISBN 978-7-5060-4269-7

I. ①跨… II. ①吉…②门…③钟… III. ①世界经济政治学-研究

②霸权主义-研究-美国 IV. ①F11-0②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7276 号

图字:01-2009-3343 号

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

KUAGUO GONGSI YU MEIGUO BAQUAN

[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门洪华 主编 钟飞腾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5060-4269-7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大国战略丛书》总序

探大国盛衰之理 究世界风云之源

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现实的把握、未来的选择。大国之战略牵动世界风云,是战略研究的当然主角。

大国实力之雄厚,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等硬指标上,还体现在文化、社会、国际影响等软性要素上,其全面性、平衡性至为重要。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负有重大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风云变幻的主导推动者,战略对其盛衰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所谓“权谋方略……邦国系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旧唐书》卷八十四列传第三四);其战略影响之广远如何强调也不过分,大国以雄厚实力为根基,常怀引领风潮乃至扭转乾坤之意志,其战略目标之宏大、其战略谋划之深远、其战略态势之恢宏素来为学术界、政策界关注之核心。

大国未必静若处子,却不时动若脱兔,引领国际风云。鉴于各大国历史经验不同,实力地位和国内外环境差异甚大,所追求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各不相同,为自身利益考虑,大国之间任何时候都有一个相互借重或彼此排斥的问题,一国战略决策必然影响他国的内政外交。在某种意义上,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国际情势,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可以说,大国关系是决定国际结构、左右国际进程、促进人类思想创新的主要力量。一国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必以他者尤其是主要大国为参照对象、利益攸关方,如鬼谷子所言:“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

静”(《鬼谷子·量权》)。换言之,研究主要大国的战略,剖析大国关系及其塑造乃至主导的国际环境,是所有国家制定战略最重要的外在依据。

跨入 21 世纪,伴随着世界转型的加速,中国成为世界关注中心,诸大国战略应时而动,大国战略竞争凸显为新时代的核心议题。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转型并行,赋予中国巨大的战略塑造空间。另一方面,诸大国对中国崛起更为敏感,正在经历从不适应到逐步适应的过程。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有赖于坚持“大国是关键”的战略布局,探究世界风云变幻之源,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深入剖析大国兴衰之理,把握大国战略的内在逻辑,妥善处理大国关系,“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六韬·顺启》)。

置身世界转型大潮之中,诸大国更加注重合作与协调,进一步相互借重,却也一时难以超越西方长期主导造就的惯性思维。韩非子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他展现的似是当今大国的战略图景。顾炎武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文集》卷四),他期待的更是历久弥新的天下情怀。以此为警示,本文库旨在广邀一流学者,翻译名著与创作精品并举,以俯瞰数世纪以来的波诡云翳,解读世界诸大国盛衰之理,探究世界风云变幻之源,为中国世界大国之路提供参照,为和谐世界之未来而筹划。

检视往昔,启迪当世,贡献未来,本丛书视之为历史使命,并为此执着。

是为序。

门洪华

2010 年 1 月 1 日

译者序

——跨国公司与国家兴衰

罗伯特·吉尔平是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被誉为“七贤人”之一。其1975年出版的《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不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开拓了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从学术继承性讲,吉尔平后来被翻译成中文的所有著述,其学术渊源都从本书开始。从现实的关联性看,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走出去”的关系也将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不失为一份有益的参考。

一、罗伯特·吉尔平的生平与学术研究

罗伯特·吉尔平1930年出生于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1960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前在美国海军服役三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吉尔平一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直至1998年退休。吉尔平1969年获得古根海姆学者称号,1967—1968年以及1976—1977年度获得洛克菲勒学者称号。吉尔平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并担任1984—1985年度美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吉尔平的学术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线,前后大致分为两个阶

段。吉尔平早年的研究专长是科学与技术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1970年之前,吉尔平主要集中研究欧洲事务,关注欧洲诸国复兴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及不同欧洲国家的产业和技术政策等。这一时段发表了《美国科学家与核武器政策》(1962年)与《科学国家时代的法国》(1968年)。

进入70年代以后,吉尔平参与并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这种政治经济学转向主要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现实与学术潮流两个方面的触动。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是国际政治经济发生大变革的时代。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其他国家的货币不再捆绑美元,美元和黄金的兑换也不再保持在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这一比价。美国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经济秩序稳定的考虑,直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如何有效管理全球经济体系就成了决策界的重大问题。

另外一方面,吉尔平的学术积累到了一个需要以及可能转向政治经济学路径的时刻。需要本身源于吉尔平自己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和判断。吉尔平从研究法国、德国与美国政治经济关系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政治和经济存在关联。但在那个时代,坚持政治经济相关联的分析被美国学术界的主流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吉尔平在广泛阅读经济史和经济理论著作之后,发现了历史上的重商主义也强调财富与权力的互动关系,这种传统与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具有很大的类似性。自此,吉尔平更加倾向于研究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关注权力背后不断上升的技术和效率渊源,以及经济运行的政治基础。^①

此外,这种转向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兴起的政治经济学学术潮流。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加强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以哈佛大学为阵地的一批年轻学者从“复合相互依赖”的角度研究“低政治”议题。当时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约瑟

^① Robert Gilpin, "Conver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view with Robert Gilp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05, pp. 361-372.

夫·奈(Joseph Nye),与毕业于该校不久的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博士受邀担任《国际组织》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两位年轻学者不满于当时主流的现实主义研究思路以及该杂志的政策分析评论型文章,决意从跨国联系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新行为体和议题,吉尔平受邀参与这一项目。1971年,这一组文章出现在《国际组织》杂志上,随后以《跨国联系与世界政治》为题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尔平贡献的一章是《跨国经济关系的政治学》,^①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是吉尔平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石,蕴含着后来被持续深化与拓展的一系列思想火花。比如,《跨国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一文起首引用的两段关于跨国公司的判断,就是《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的第一章“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的两段引言。此外,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霸权稳定论思想的发源地。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认为吉尔平1971年的文章“不仅为我提供了智力上的指引,而且为我在未来十年的工作指明了方向”^②。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跨国联系与世界政治》一书导论部分引用的文献超过三分之一都是有关跨国公司的研究。

在此期间,增进吉尔平对经济学以及国际经济关系认识的两位重要人物是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与雷蒙·弗农(Raymond Vernon)。科恩与吉尔平属于同代人,1963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4—1971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研究专长是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以及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普大的经济系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共用一栋大楼,当时吉尔平与科恩的办公室正好对过。正像吉尔平在《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致谢中提到的,“研究和写作该书时,科恩在智识上给予巨大的帮助”。

雷蒙·弗农从学术资历上看要比吉尔平早很多。1941年从哥伦比

^①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5, No. 3,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1971, pp. 398–419.

^② 转引自本杰明·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杨毅、钟飞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参与执行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1959年转入哈佛大学任教。1964年哈佛大学商学院从福特基金会接受了一批资助,启动了一项研究跨国企业的长期项目,弗农是当时这个项目的主任。1971年弗农出版了经典之作《主权困境:美国企业的跨国扩展》。写作和修改此书的时候,弗农正好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兼任教授,而约瑟夫·奈与基欧汉等人当时也正好在筹划跨国联系的一组文章,这批年轻人有关跨国模式的思考受到弗农的影响和鼓励。正如吉尔平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提到的,写作《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时“我尤其对雷蒙·弗农教授里程碑式的《主权困境》一书印象深刻”。

进入80年代以后,吉尔平把70年代开创的学术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从霸权兴衰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两个角度深化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1981年吉尔平出版《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该书核心思想是运用成本与收益的方法分析大国兴衰对国际体系变革的影响。^①在吉尔平看来,国际体系变革的起点主要是指强国接受现有的领土、政治和经济的安排这样一种国家均衡的状态,而国际政治变革的主要原因在于霸权战争。历史上,商业战争是变革国际体系的动因和手段,这一点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有论述。但更为深远和长时段的变革动力恐怕是民族国家体系兴起之后,国家财富和力量的变革。在变革一个国际体系时,吉尔平强调:“权力分配本身最终取决于经济基础。如果由于经济效率、工业场所或者贸易趋势的变化,财富的源泉基础也发生变化的话,必定会相应地发生群体间和国家间权力的重新分配。为获得权力而进行斗争与力图在经济上获益的愿望最终会纠缠在一起。”^②1986年国际战略学家陈忠经在《当代国际战略态势》一文中提到了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介绍了吉尔平赞成未来国际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中文版参考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67页。

格局向多极化转变的看法。^①

代表吉尔平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水平的经典著作是1987年出版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89年,该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印数达到了5000册。复旦大学教授刘同舜在序言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美国著名大学政治系中听课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但“政治经济学此番焕发青春的动力与以往不同。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②促使吉尔平撰写此书的现实原因同样也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看到自身所维持的体系受到日本、西欧在经济上的挑战,美国人开始担心,并力图从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入手来研究变革的原因。吉尔平在1987年的书中就提出,要应对80年代动荡的国际格局,与其依靠多元领导,还不如着重依赖于美国自己来得更好。^③随着《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翻译出版,国内学术界开始充分关注罗伯特·吉尔平的思想,有人称该书是一本“步入21世纪的国际关系学”^④。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延续性同样也很清楚,与吉尔平70年代的思想一脉相承。吉尔平在该书序言中这样讲:“拙著《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就是我在这一时期为阐明我的思想观点以及为后来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个领域作出贡献而进行研究的第一个成果。在那本书中,我扩展了我早期论文中的论述,同时考察对比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现实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我认为,美国的跨国公司海外扩展只有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政治体系的来龙去

① 陈忠经:《当代国际战略态势》,载《现代国际关系》1986年第2期。

② 刘同舜:《写在前面的话》,载罗伯特·吉尔平:《国际经济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③ 参见克拉斯纳为该书作的书评,Stephen D. Krasn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2, 1988, p. 681.

④ 黄仁伟:《步入21世纪的国际关系学——评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载《世界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任东来:《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与“霸权稳定论”——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6期。

脉才能得到理解。”^①

进入 21 世纪之后,吉尔平出版了《全球政治经济学:理解国际经济秩序》一书,明确把自己的学术倾向定位于国家中心的现实主义。该书出版之后,中国学术界高度赞誉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贡献。^②与早先强调国际体系的作用不同,吉尔平日益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以及诸大国各种类型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特点。“研究国民经济的不同类型(即‘各国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它们对全球经济的意义已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实际上,这个观点最早出版于 1996 年,吉尔平在一篇论述经济演化的论文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系”(national systems of political economy)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④这种观点至少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实和研究的新进展,20 世纪 90 年代现实世界的情形是西方国家呼吁的全球化进一步得以实现,绝大多数国家都卷入全球性生产格局中;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减少了对国际体系的探讨,转而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吉尔平强调各国的特性与差异性,正是出于更好地理解国家决策和管理全球化进程的需要。

此外,吉尔平一如既往地突出大国的重要性。“国家,特别是大国,制定了每个企业和跨国公司必须遵循的规章,这些规章一般反映了占主

①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经济关系政治经济学》,序言,第 3 页。

② 相关文献参见郑先武:《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罗伯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观点述评》,载《欧洲》2003 年第 5 期;郑先武:《“国家中心”现实主义的解读——评〈全球政治经济学〉》,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8 期;刘慧华:《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评吉尔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载《美国研究》2004 年第 1 期。关于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也可参见 Douglas A. Hicks, “Thinking Globally: Making sense of a Shrinking World”, *The Christian Century*, 118, No. 34, 12, 2001, pp. 14-17. 作者认为这一思路是对纯粹经济学解释的扩展。

③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5 页。

④ Robert Gilpin, “Economic Evolution of National Syst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3 (Sep., 1996), pp. 411-431. 需要提及的是,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历史上,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于 1841 年出版了一本富有影响力的著作,英文书名就叫做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导地位的国家及其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①这段话实质上是国家中心的现实主义的核心,即政治框架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方向和可能性。这个观点与1971年《跨过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一文中的表述如出一辙。

二、《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的学术地位

吉尔平出版《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时,正当盛年(45岁),这本书奠定吉尔平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引导了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学研究的潮流,被人称赞为“分析跨国公司和国际政治经济的一部早期但具开创性的现实主义作品”^②。在学术界,该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立基之作,为这一学科在美国学界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吉尔平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国际关系的思路,大胆地对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思路进行了两大分类:一种是当时正隐隐然出现的新政治经济学思路,一种是吉尔平本人赞赏的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路子,后者是继承当时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与国际体系宏观研究思路的反映,也是对西方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恢复。

吉尔平对跨国公司的权力研究路径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确立了标杆式的意义。在涉及到权力分析方法时,诸多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选取的章节基本出自这本书。《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对新一代的学者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被年轻一代的学者认为是一项“大的开端”。该书“打开了知识和分析的空间,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赖于此”^③。

从学科角度看,该书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第

①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第21页。

② R. J. Barry Jones, Peter M. Jones and Ken Dark,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Manchester;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8.

③ 转引自本杰明·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第81页。

一,从理论的角度开创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第二,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路径引入国际关系之中;第三,从问题领域的角度树立了直接投资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路径。

1. 开创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是否衰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正是诞生于那个时代,而吉尔平的《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被公认为是阐述霸权稳定论命题的代表作之一。

霸权稳定论的学术起源是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1973年出版的《世界大萧条,1929—1939》,在此书中金德尔伯格提出了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需要政治领导力这样一个命题。^①作为国际经济学家、历史经济学家的金德尔伯格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提出一个不同于当时主流经济学理论对大萧条的理解,20世纪60年代货币主义对大萧条缘起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失误这一解释是压倒性的。金德尔伯格在形成这一新解释时,引入了政治学中的领导者(leadership)这个概念和公共物品原理,需要注意的是,金德尔伯格在书中并未使用霸权(hegemony)这个词。金德尔伯格认为,之所以发生大萧条是因为作为霸权国家的英国失去了继续领导国际经济的能力,而能力上能够担当起这个角色的美国则缺乏意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大国肩负起维护自由贸易机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最后的清偿者等稳定器的角色,国际经济秩序的失序是不可避免的。

金德尔伯格的思想很快在政治学家中得到共鸣。吉尔平的《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与克纳斯纳1976年的《国家实力与国际贸易结构》一文被认为是阐述霸权稳定论的两篇经典文献。^② 吉尔平把金德尔伯格

^①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Penguin Books, 1986 [1973].

^② 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1976, pp. 317-347.

的思想改造成了一个更偏向于 IPE 的命题,从强调领导国出于仁慈目的提供公共物品,转入强调霸权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自身的利益,是成本收益分析之后的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的对外行为,这样从学理脉络上看就承接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议题。不过,当时他们两位都没有明确把政治性的权力决定国际经济秩序的关联性概括成一句话,而这一点对于学术发展而言则至关重要。

1980年,罗伯特·基欧汉在一篇文章中用简短的语句直接把这种关联性或者因果机制命名为霸权稳定论。^①需要说明的是,基欧汉当时提出这个命题是把它当成批评的对象或者进一步立论的反面,他是为了去否定霸权的相对衰落不一定直接造成国际经济秩序失序,为研究国际制度理论做准备。可以说正是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与争鸣姿态直接推动了后来者对霸权稳定论的证明或者证伪。吉尔平对现实世界的洞察力以及理论概括能力对该命题的推广起了巨大的作用。^②

吉尔平在本书中分析美国霸权面临欧洲的挑战,在当时是世界性的大事件。法国政治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后来在回忆录中以一章——“亨利·基辛格与美国霸权的终结”——的篇幅描述了欧洲和美国之间围绕国际货币的权力斗争,特别是法国不断挑战美国在欧洲的主导权。“由于当时美国企业乐于购进欧洲企业或在国外设立子公司,对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指责的想法,在法国国家元首的头脑里油然而生,因为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或汇兑金本位制,注定要使美国享有特权,可以用本国货币偿还债务,或更甚之,用本国货币购进外国企业。而且据说,国内通货膨胀造成的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将把其恶果扩大到整个

^① Robert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R. Holsti,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pp. 131–62.

^② 关于这一理论思想的进一步论述可参考钟飞腾:《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

世界。”^①法国和美国的复杂关系是吉尔平写作《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的现实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关注的核心议题基本上都是如何管理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关系,即美国的政策如何复兴了欧洲以及一个复兴了的欧洲将如何挑战美国的霸权。

2. 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

本书最早是吉尔平递交给美国国会的报告。美国国会关注投资话题的两个因素是:第一,阿拉伯石油美元大举冲击美国,外来资本开始侵扰美国本土;第二,美国国内由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引发工作丢失的大辩论。结果之一,1975年福特总统批准设立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美国外资政策开始发生显著性的变革。前文已经提及,吉尔平写作此书时,个人的学术路径已经转向了政治经济学。到该报告整理成书正式发表时,国际关系学科背景中的政治经济学色彩已经非常浓烈。

从理论范式上看,罗伯特·吉尔平在这本书中首次系统概括了政治经济学的三种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重商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来源于吉尔平对当时跨国公司的三种理论模式的思考,即以哈佛教授雷蒙·弗农为代表的“主权困境”模式、拉美学者倡导的“依附论”模式以及“重商主义”模式。吉尔平的这种概括在美国学术界被广泛接受,成为研究跨国经济关系的参考系。吉尔平出版于1987年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则继续沿着这一路径阐释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相互关联性。关于政治经济学思想传统的学术概括也被科恩赞赏为“这个领域所作出的最持久的贡献”。^②

从研究命题上来看,吉尔平在本书中考察了市场力量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本书的核心命题是,跨国公司扩展是美国国家实力扩张的结果,研究美国跨国公司必须考虑国家实力因素。吉尔平认为,美国在欧洲和全球的政治地位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向欧洲和全世界扩张奠定了基础,反过

^①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杨祖供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33页。

^② 本杰明·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第37页。

来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也为巩固美国实力提供了资金和技术的支撑。由于直接投资能够缩小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吉尔平建议美国应当采用贸易战略而非投资战略来确保美国的实力。吉尔平的这一思路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关于跨国公司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挖掘出了权力因素在西方国家开拓世界市场中的作用。

从研究方法来看,吉尔平采用了比较案例的实证分析。吉尔平在《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追踪分析了英国霸权的兴衰与海外投资的联系,并且把这一历史性的分析关联到美国战后的繁荣、第三世界国家的抗争以及美国盟友的竞争与合作中,可以说这本书是一幅全景式的大国实力更替画卷。该书体现了一位极端优秀的学者对英国霸权的衰落、美国霸权的兴盛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敏锐反应和深刻思考。这一点,吉尔平在其出版于1981年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有更为详细深入的分析。从历史角度阐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是“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特色。^①

此外,吉尔平在本书第二章的最后部分“工业的传播与国际冲突”,成为日后安全与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先潮。经济增长以及国家间的产业传播具有非常广泛的安全外部性,通常情况下政治同盟之间或者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之间,其经济贸易往来更加密切。反之,国家也可以通过加深经贸联系提高政治关系。更进一步而言,主导型产业在国家之间的扩散将给国内政治带来重大冲击,国内利益集团围绕产业兴衰的持续争论有可能导致剧烈的政治变革。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两百年间,纺织业、汽车业的周期轮替给国际政治经济带来巨大的变革,吉尔平对国内、国际间产业转移的政治效应分析具有持久性。^②而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安全

① 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

② James R. Kurth,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Product Cycle: Industri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Outco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3, No. 1, 1979, pp. 1-34.

与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吉尔平的研究。^①

3. 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关注公司的跨国经营如何影响国际体系稳定和国家间的实力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一代学者重点探讨母国和母国的跨国公司两者之间的关系,展示了美国在外资问题上到底执行一种怎样的国家战略,以及政府界定的国家利益如何被国内的社会团体所接受。1978年斯蒂芬森·克拉斯纳在其名著《保卫国家利益》中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美国如何把直接投资当成一种国家方略,控制原材料的供应。克拉斯纳强调,国家具有独立的、客观的国家利益。

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拓展了激进主义的研究路径。他对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投资研究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他196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海默认为公司之所以能够进行跨国经营,是因为市场不完善以及企业不同于市场的内部化优势,即企业所具有的垄断优势。^③海默的这一思想影响了众多研究者。但海默随后并没有接着深化这一思路,而是转入分析公司垄断优势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分析了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之间潜在的冲突。海默指出,跨国公司试图按照公司内部的分工模式,重组民族国家之间的分工模式。一些至关重要的功能与职位被留在发达国家的重要城市中,而一些层次较低的工作则被分配至世界其他地区。面对日益强大的跨国公司,海默担心民族国家失去控制经济政策的能力。^④

当然,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产生更大影响的是吉尔平的分析。吉尔平则强调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既体现了美国权力也会威胁到美国权

① 可参考 Jonathan Kirshner, "Political Economy in Security Studies after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1, 1998, pp. 64-91.

② 更进一步的展开请参考钟飞腾:《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

③ Stephen H. Hymer,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6.

④ Stephen Hymer, "The Efficiency (Contradiction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0, No. 2, 1970, pp. 441-448.